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十五”重点项目成果

中国社会思想史资料选辑

民 国 卷（上）

主编 陆学艺 王处辉

选编 姜章胜 李勤

广西人民出版社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 录

梁启超	(员)
欧游中之一般观察及一般感想(节录)	(员)
在中国公学演说	(苑)
复张东荪书论社会主义运动	(怨)
高一涵	(愿)
近世三大政治思想之变迁	(愿)
渊摇泉	(圆泉)
对于新旧思潮的舆论	(圆泉)
毋摇忘	(圆蒙)
最近新旧思潮冲突之杂感	(圆蒙)
鲁摇逊	(圆缘)
学界新思想之潮流	(圆缘)
李大钊	(圆苑)
新旧思潮之激战	(圆苑)
我的马克思主义观(节录)	(圆怨)
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	(圆圆)
唯物史观在现代社会学上的价值	(圆愿)
再论问题与主义	(缘圆)
由纵的组织向横的组织	(缘缘)
自由与秩序	(缘苑)
社会问题与政治	(缘苑)
陈独秀	(圆圆)
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	(圆圆)
旧思想与国体问题	
——在北京神州学会讲演	(圆猿)



文化运动与社会运动	(622)
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	(622)
关于社会主义问题	
——在广东高师的讲演	(622)
中国农民问题	(622)
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	(622)
邓中夏	(622)
中国现在的思想界	(622)
思想界的联合战线问题	(622)
胡适	(622)
实验主义(节录)	(622)
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	(622)
东西文化之比较	(622)
民主与反民主的观念体系的冲突(节录)	(622)
当前中国文化问题(节录)	(622)
蓝公武	(622)
问题与主义(节录)	(622)
孙中山	(622)
建国方略(节录)	(622)
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	(622)
五权宪法	(622)
张闻天	(622)
社会问题	(622)
邓演达	(622)
政治主张(节录)	(622)
周鲠生	(622)
时局之根本的解决	(622)
李达	(622)
劳动者与社会主义	(622)

讨论社会主义并质梁任公	(猿缘)
晏阳初	(猿苑)
平民教育概论	(猿苑)
农村运动的使命及其实施的方法与步骤	(猿苑)
十年来的中国乡村建设	(猿愿)
开发民力摇建设乡村	(猿愿)
杨开道	(猿苑)
农村社会学(节录)	(猿苑)
梁漱溟	(猿愿)
二卷摇乡村建设理论	(猿愿)
一卷摇东西文化及其哲学(节录)	(猿缘)
社会演进上中西殊途(节录)	(猿缘)
中国文化要义(节录)	(猿愿)
冯友兰	(猿怨)
中国现代民族运动之总动向	(猿怨)
别共殊	(猿怨)
新理学(节录)	(猿园)
陈序经	(猿苑)
中国文化之出路(节录)	(猿苑)
全盘西化的理由(节录)	(猿愿)
从西化问题的讨论里求得一个共同信仰	(猿猿)
吴景超	(猿怨)
我们没有歧路	(猿怨)
再论发展都市以救济农村	(猿源)
郭沫若	(猿园)
复兴民族的真谛	(猿园)
三年来的文化战	(猿园)
历史是进化的	(猿苑)
钱摇穆	(猿猿)



《国史大纲》引论（节录）	（袁猿）
东西文化之再探讨	（袁愿）
何干之	（袁猿）
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节录）	（袁猿）
薛暮桥	（源愿）
中国农村中的基本问题	（源愿）
中国农村社会底性质	（源猿）
马寅初	（源猿）
中国工业化与民主是不可分割的 ——在重庆星五聚餐会上的讲演	（源猿）
工业革命与土地政策	（源愿）
中国经济之路（节录）	（源愿）
许涤新	（源愿）
关于中国以何立国的问题	（源愿）
陈翰笙	（源愿）
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之发轫（节录）	（源猿）
中国的农村研究	（源猿）
三十年来的中国农村	（源愿）
吴泽霖	（源猿）
社会约制（节录）	（源猿）
潘光旦	（源猿）
中国之家庭问题（节录）	（源猿）
派与汇（代序）	（源猿）
平等驳议（节录）	（源猿）
家制与政体	（源愿）
陈瑶达	（缘猿）
现代中国人口（节录）	（缘猿）
后记	（缘猿）



梁启超

梁启超(1873—1929)，中国近代思想家、教育家、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宣传家。字卓如，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广东兴会人，清光绪年间举人。1898年执贖于康有为门下，并成为其发动变法改良运动的得力助手。主编《时务报》，发表论文，宣传改良主义思想。戊戌变法失败后逃往日本。先后创办《清议报》、《新民丛报》，宣扬保皇立宪思想。曾积极介绍西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社会学说，在知识界影响很大。辛亥革命后，曾与袁世凯、段祺瑞合作，后退出政界，潜心学术活动。哲学上认为“三界唯心”，世界上没有物境，只有心境，物境是心境的幻象。“一切物境皆虚幻，惟心所造之境为真实”，故曰“心由境造”(《自由书·唯心》)。推崇王守仁“致良知”，对中国传统哲学近代化很有贡献。不同意宋儒把理学说成超越事物的绝对抽象概念，重新规定它的内涵，“夫两个以上之想象，常相依而不可离，是即所谓定理也”(《近世文明初祖二大家之学说》)。并以理为事物发展过程中必然的因果联系。指出并非不证自明的抽象精神，也非人心固有的主观观念，理的真理有待证实，在实验中进行检验，“必藉实验而后得其真”(《格致学沿革》)。提出“变者，古今之公理也”(《变法通议自序》，宣扬英雄史观，“世界者何？豪杰而已矣，舍豪杰而无世界”(《豪杰之公脑》)。倡导西方自由、平等、博爱和天赋人权理论，批判传统伦理纲常，以“新民德”为国家自强的前提，民德不兴，过亦不立。对中国先秦、明清思想史、佛教义理等俱有精深研究，曾创文体改革的“诗界革命”和“小说界革命”。一生著述极宏富，达15000余万字，编有《饮冰室合集》。

欧游中之一般观察及一般感想^①(节录)

七摇科学万能之梦

大凡一个人，若使有个安心立命的所在，虽然外界种种困苦，也容易

^① 本篇节选自《欧游心影录》第一部分。所选为《欧游中之一般观察及一般感想》的上篇《大战前后之欧洲》中第七节，下篇《中国人之自觉》第十一、十三节。



抵抗过去。近来欧洲人却把这件没有了。为什么没有了呢？最大的原因就是过信“科学万能”。原来欧洲近世的文明有三个来源：第一是封建制度，第二是希腊哲学，第三是耶稣教。封建制度规定各人和社会的关系，形成一个道德的条件和习惯。哲学是从智的方面研究宇宙最高原理及人类精神作用，求出个至善的道德标准。宗教是从情的意的两方面，给人类一个“超世界”的信仰，那现世的道德，自然也跟着得个标准。十八世纪前的欧洲，就是靠这个过活。自法国大革命后，封建制度完全崩坏，古来道德的条件和习惯，大半不适用，欧洲人的内部生活，渐渐动摇了。社会组织变更，原是历史上常态，生活就跟着他慢慢蜕变，本来没有什么难处，但这百年来的变更却与前不同。因科学发达结果，产业组织，从根柢翻新起来，变既太骤，其力又太猛，其范围又太广。他们要把他的内部生活凑上来和外部生活相应，却处处措手不及。最显著的就是现在都会的生活和从前堡聚的村落的生活截然两途。聚了无数素不相识的人在一个市场或一个工厂内共同生活，除了物质的利害关系外，绝无情感之可言，此其一。大多数人无恒产，恃工为活，生活根据，飘飘无着，好像枯蓬断梗，此其二。社会情形太复杂，应接不暇，到处受刺戟，神经疲劳，此其三。劳作完了想去耍乐，耍乐未完又要劳作，昼夜忙碌，无休养之余裕，此其四。欲望日日加高，百物日日加贵，生活日日加难，竞争日日加烈，此其五。以上所说，不过随手拈出几条。要而言之，近代人因科学发达，生出工业革命，外部生活变迁急剧，内部生活随而动摇，这是很容易看得出的。内部生活，本来可以凭宗教哲学等等力量，离去了外部生活依然存在。近代人却怎样呢？科学昌明以后，第一个致命伤的就是宗教。人类本从下等动物蜕变而来，那里有什么上帝创造，还配说人为万物之灵吗？宇宙间一切现象，不过物质和他的运动，那里有什么灵魂，更那里有什么天国？讲到哲学，从前康德和黑格尔时代，在思想界俨然有一种权威像是统一天下。自科学渐昌，这派唯心论的哲学便四分五裂。后来冈狄的《实证哲学》和达尔文的《种源论》同年出版，旧哲学更是根本动摇。老实说一句，哲学家简直是投降到科学家的旗下了。依着科学家的新心理学，所谓人类心灵这件东西，就不过物质运动现象之一种。精神和物质的对待，就根本不成立。所谓宇宙大原则，是要用科学的方法试验得来，不是用哲学的方法冥想得来的。这些唯物派的哲学家，托庇科学宇下建立一种纯物质的、纯机械的人生观。把一切内部生活外部生活，都归到物质运动的“必然法则”之下。这种法则其实可以叫做一种变相的运命前定说。不过旧派的前定说，说运命是由八字里带来或是由上帝注定，这新派的前定说，说运命是

由科学的法则完全支配。所凭借的论据虽然不同,结论却是一样。不惟如此,他们把心理和精神看成一物,根据实验心理学,硬说人类精神也不过一种物质,一样受“必然法则”所支配。于是人类的自由意志,不得不否认了。意志既不能自由,还有什么善恶的责任?我为善不过那“必然法则”的轮子推着我动,我为恶也不过那“必然法则”的轮子推着我动,和我什么相干?如此说来,这不是道德应如何变迁的问题,真是道德这件东西能否存在的问题了。现今思想界最大的危机,就在这一点。宗教和旧哲学,既已被科学打得个旗靡辙乱,这位“科学先生”便自当仁不让起来,要凭他的试验发明个宇宙新大原理。却是那大原理且不消说,敢是各科各科的小原理,也是日新月异。今日认为真理,明日已成谬见。新权威到底树立不来,旧权威却是不可恢复了。所以全社会人心都陷入怀疑沉闷畏惧之中,好像失了罗针的海船遇着风遇着雾,不知前途怎生是好。既然如此,所以那些什么乐利广义、强权广义越发得势。死后既没有天堂,只好尽这几十年尽地快活。善恶既没有责任,何妨尽我的手段来充满我个人欲望?然而享用的物质增加速率,总不能和欲望的腾升同一比例,而且没有法子令他均衡。怎么好呢?只有凭自己的力量自由竞争起来,质而言之,就是弱肉强食。近年来甚么军阀,甚么财阀,都是从这条路产生出来。这回大战争,便是一个报应。诸君又须知,我们若是终久立在这种唯物的机械的人生观上头,岂独军阀财阀的专横,可憎可恨 就是工团的同盟抵抗乃至社会革命,还不同是一种强权作用。不过从前强权,在那一班少数人手里,往后的强权移在这一班多数人手里罢了。总之,在这种人生观底下,那么千千万万人前脚接后脚的来这世界走一趟住几十年,干什么呢?独一无二的目的就是抢面包吃。不然就是怕那宇宙间物质运动的大轮子缺了发动力,特自来供给他燃料。果真这样,人生还有一毫意味,人类还有一毫价值吗?无奈当科学全盛时代,那主要的思潮,却是偏在这方面。当时讴歌科学万能的人,满望着科学成功黄金世界便指日出现。如今功总算成了,一百年物质的进步,比从前三千年所得还加几倍。我们人类不惟没有得着幸福,倒反带来许多灾难。好像沙漠中失路的旅人,远远望见个大黑影,拼命往前赶,以为可以靠他向导,那知赶上几程,影子却不见了,因此无限凄惶失望。影子是谁?就是这位“科学先生”。欧洲人做了一场科学万能的大梦,到如今却叫起科学破产来。这便是最近思潮变迁一个大关键了^①。

① (自注)读者切勿误会因此菲薄科学,我绝不承认科学破产,不过也不承认科学万能罢了。



十一 摇社会主义商榷

第十一,讲到国民生计上,社会主义,自然是现代最有价值的学说,国内提倡新思潮的人,渐渐的注意研究他,也是很好的现象。但我的意见,提倡这主义,精神和方法,不可并为一谈。精神是绝对要采用的。这种精神,不是外来,原是我所固有的。孔子讲的“均无贫和无寡”,孟子讲的“恒产恒心”,就是这主义最精要的论据,我并没有丝毫附会。至于实行方法,那就各国各时代种种不同,欧美学者,同在这面大旗底下,已经有无数派别。应该采用那一种,采用的程度如何,总要顺应本国现时社会的情况。欧洲为什么有社会主义?是由工业革命孕育出来。因为工业组织发达得偏畸,愈发达愈生毒害,社会主义家想种种方法来矫正他,说得都是对症下药。在没有工业的中国,想要把他悉数搬来应用,流弊有无,且不必管,却最苦的是搔不着痒处。试举几个例:譬如要学他们结个工团和资本阶级对抗,就要先问国内是否有资本阶级?若没有,便是无的放矢。军阀官僚拥几百万家私算得资本阶级吗?各国资本家在国民生计一个总单位里头,生产方面,关系何等重大。军阀官僚连抢带骗,左手得来的钱,右手向不生产的方面尽情挥霍,配说资本家吗?至于有些正当商人,辛苦经营个把公司,正在和外货竞争弄得焦头烂额,我们硬说他是资本阶级,施行总攻击,问良心其实不忍。又如马克思一派提倡的生产机关国有论,在欧美岂非救时良药?若要搬到中国,就要先问什么是生产机关,我们国内有了不曾。就算有了罢,说要归到国家,我头一个就反对。你不看见铁路么?铁路国有权,是欧美社会党最坚持的大问题。我们不是早办了吗?结果如何?在这种政治组织之下提倡集产,岂非杀羊豢虎!以上所举,拿来做个比方,并不是论他的方法良不良,只是论我们用得着用不着。至于有的人说现在中国应注重的是生产问题,不是分配问题,这句话我却不敢完全同意。我的主张是:一面用全力奖励生产,同时眼光并须顾及分配。战后各国拼命的扩充输出,国际间产品竞争,比前更烈,我若不图抵制,何以自存?但工业方当幼稚之时,萌蘖是摧残不得,煽动工人去和办工厂的作对,我认为等于自杀。但当工业发轫之初,便应计及将来发达以后,生出何种影响。欧洲工业革命时代,就因为没有思患预防,如今闹到积重难返,费尽九牛二虎之力,还矫正不了几分。好在我们是个后进国,他们走的路怎么错法,都已眼见;他们所用的医方,一张一张的罗列供我参考。我们只要避了那迷人的路,用了那防病的方,令工业组织一起手便是合理

健全的发展,将来社会革命这个险关,何尝不可以免掉?须知革命都是出于不得已,本非吉祥善事,免得掉还是免掉的好哩。所以我对于目前产业上的意见,主张发挥资本和劳动的互助精神。现在各国工厂所给工人的利益及方便,我们要调查详备,尽力尽施。一面还要国家从税则上及其他种种立法上,力求分配趋于公平,同时生产组合、消费组合等项,最要极力提倡,令小资本家以至赤贫的工人,都得有正当防卫的武器。至于劳动者本身的自治精神,亦应在学校内工厂内设法陶养。不论公共企业或私人企业,都得尽情发挥互助的精神。这便是目前坦坦平平的一条大路。至于太过精辟新奇的学说,只好拿来作学问上解放思想的资料,讲到实行,且慢一步罢。

十三 摇中国人对于世界文明之大责任

以上十二段,我都是信手拈来,没有什么排列组织。但我觉得我们因此反省自己从前的缺点,振奋自己往后的精神,循着这条大路,把国家挽救建设起来,决非难事。我们的责任,这样就算尽了吗?我以为还不止此。人生最大的目的,是要向人类全体有所贡献。为什么呢?因为人类全体才是“自我”的极量,我要发展“自我”,就须向这条路努力前进。为什么要有国家?因为有个国家,才容易把这国家以内一群人的文化力聚拢起来、继续起来、增长起来,好加入人类全体中助他发展。所以建设国家是人类全体进化的一种手段,就像市府乡村的自治结合,是国家成立的一种手段。就此说来,一个人不是把自己的国家弄到富强便了,却是要叫自己国家有功于人类全体。不然,那国家便算白设了。明白这道理,自然知道我们的国家,有个绝大责任横在前途,什么责任呢?是拿西洋的文明来扩充我的文明,又拿我的文明去补助西洋的文明,叫他化合起来成一种新文明。我在巴黎曾会着大哲学家蒲陀罗月~~月~~ (柏格森之师)。他告诉我说:“一个国民,最要紧的是把本国文化发挥光大。好像子孙袭了祖父遗产,就要保住他,而且叫他发生功用。就算很浅薄的文明,发挥出来,都是好的,因为他总有他的特质,把他的特质和别人的特质化合,自然会产出第三种更好的特质来。你们中国,着实可爱可敬。我们祖宗裹块鹿皮、拿把石刀在野林里打猎的时候,你们不知已出了几多哲人了。我近来读些译本的中国哲学书,总觉得他精深博大。可惜老了,不能学中国文。我望中国人总不要失掉这分家当才好。”我听着他这番话,觉得登时有几百斤重的担子加在我肩上。又有一回,和几位社会党名士闲谈,我说起孔



子的“四海之内皆兄弟”、“不患寡而患不均”，跟着又讲到井田制度，又讲些墨子的“兼爱”、“寝兵”。他们都跳起来说道：“你们家里有这些宝贝，却藏起来不分点给我们，真是对不起人啊！”我想我们还殷不上说对不起外人，先自对不起祖宗罢了。近来西洋学者，许多都想输入些东方文明，令他们得些调剂。我仔细想来，我们实在有这个资格。何以故呢？从前西洋文明，总不免将理想实际分为两橛，唯心唯物，各走极端。宗教家偏重生，唯心派哲学高谈玄妙，离人生问题，都是很远。科学一个反动，唯物派席卷天下，把高尚的理想又丢掉了。所以我从前说道：“顶时髦的社会主义，结果也不过抢面包吃。”这算得人类最高目的么？所以最近提倡的实用哲学、创化哲学，都是要把理想纳到实际里头，图个心物调和。我想我们先秦学术，正是从这条路上发展出来。孔老墨三位大圣，虽然学派各殊，“求理想与实用一致”，却是他们共同的归着点。如孔子的“尽性赞化”、“自强不息”，老子的“各归其根”，墨子的“上同于天”，都是看出有个“大的自我”，“灵的自我”和这“小的自我”，“肉的自我”同体，想要因小通大，推肉合灵。我们若是跟着三圣所走的路，求“现代的理想与实用一致”，我想不知有多少境界可以辟得出来哩。又佛教虽创自印度，而实盛于中国。现在大乘各派，五印全绝。正法一脉，全在支那。欧人研究佛学，日盛一日，梵文所有经典，差不多都翻出来。但向梵文里头求大乘，能得多少。我们自创的宗派，更不必论了。像我们的禅宗，真可以算得应用的佛教。世间的佛教，的确是要印度以外才能发生，的确是表现中国人特质，叫出世法和现世法并行不悖。现在柏格森、倭铿等辈，就是想走这条路还没走通。我常想，他们若能读唯识宗的书，他的成就一定不止这样。他们若能理解禅宗，成就更不止这样。你想，先秦诸哲、隋唐诸师，岂不都是我们仁慈圣善的祖宗积得好几大宗遗产给我们吗？我们不肖，不会享用，如今倒要闹学问饥荒了。就是文学、美术各方面，我们又何尝让人？国中那些老辈，故步自封，说什么西学都是中国所固有，诚然可笑。那沉醉西风的，把中国甚么东西都说得一钱不值，好像我们几千年来，就像土蛮部落，一无所有，岂不更可笑吗？须知凡一种思想，总是拿他的时代来做背景。我们要学的，是学那思想的根本精神，不是学他派生的条件。因为一落到条件，就没有不受时代支配的。譬如孔子，说了许多贵族性的伦理，在今日诚然不适用，却不能因此菲薄孔子。柏拉图说奴隶制度要保存，难道因此就把柏拉图抹杀吗？明白这一点，那么研究中国旧学，就可以得公平的判断，去取不至谬误了。却还有很要紧的一件事：要发挥我们

的文化,非借他们的文化做途径不可。因为他们研究的方法,实在精密,所谓“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不然,从前的中国人那一个不读孔夫子,那一个不读李太白,为甚么没有人得着他好处呢?所以我希望我们可爱的青年,第一步,要人人存一个尊重爱护本国文化的诚意;第二步要用那西洋人研究学问的方法去研究他,得他的真相;第三步,把自己的文化综合起来,还拿别人的补助他,叫他起一种化合作用,成了一个新文化系统;第四步,把这新系统往外扩充,叫人类全体都得着他好处。我们人数居全世界人口四分之一,我们对于人类全体的幸福,该负四分之一的责任。不尽这责任,就是对不起祖宗,对不起同时的人类,其实是对不起自己。我们可爱的青年啊!立正,开步走!大海对岸那边有好几万万,愁着物质文明破产,哀哀欲绝的喊救命,等着你来超拔他哩。我们在天的祖宗三大和许多前辈,眼巴巴盼望你完成他的事业,正在拿他的精神来加佑你哩。

原载上海《时事新报》一九二〇年三月,又见《饮冰室专集》二十三

在中国公学演说

此次游欧,为时短而历地多,故观察亦不甚清切。所带来之土产固不甚多,唯有一件可使精神大受影响者,即悲观之观念完全扫清是已。因此精神得以振作,换言之即将暮气一扫而空。此次游欧所得止此。何以能至此?则因观察欧洲百年来所以进步之故,鄙人对于此且有所感想。

考欧洲所以至此者,乃因其社会上政治上固有基础,而自然发展以成者也。其固有基础与中国不同,故中国不能效法。欧洲在此百年中可谓在一种不自然之状态中,亦可谓在病的状态中。中国效法此种病态,故不能成功。

第一以政治论。例如代议制乃一大潮流,亦十九世纪唯一之实物。各国皆趋此途,稍有成功,而中国独否。此何故?盖代议制在欧洲确为一种阶级,而在中国则无可能性。盖必有贵族地主,方能立宪,以政权集中于少数贤人之手,以为交付于群众之过渡。如英国确有此种少数优秀之人,先由贵族扩至中产阶级,再扩至平民,以必有阶级始能次第下移,此少数人皆有自任心。日本亦然,以固有阶级之一少数优秀代表全体人民。至于中国则不然。自秦以来,久无阶级,故欲效法英日,竟致失败,盖因社



会根底完全不同故也。中国本有民意政治之雏形，全国人久已有舆论民岩之印象，但其表示之方法，甚为浑漠为可憾耳。如御史制度，即其一例。其实自民本主义而言，中国人民向来有不愿政府干涉之心，亦殊合民本主义之精神。对于此种特性，不可漠视。往者吾人徒作中央集权之迷梦，而忘却此种固有特性。须知集权与中国民性最不相容，强行之，其结果不生反动，必生变态。此所以吾人虽欲效法欧洲，而不能成功者也。但此种不成功，果为中国之不幸乎？抑幸乎？先以他国为喻，如日德究竟其效法于美者为成功欤？日本则因结果未揭晓，悬而勿论。且言德国，其先本分两面派，一为共和统一派，一为君主统一派，迨俾士麦出，君主统一乃成。假定无俾氏，又假定出于共和统一之途，吾敢断言亦必成功，特不过稍迟耳。又假定其早已采用民本主义，吾敢决其虽未能发展如现在之速，然必仍发达如故，则可见五十年乃绕道而走，至今须归原路，则并非幸也可知矣。总之，德国虽学英而成，然其价值至今日则仍不免于重新估定。如中国虽然为学而失败者，然其失败未必为不幸。譬如一人上山，一人走平路，山后无路，势必重下，而不能上山者则有平路可走。可知中国国民此次失败不过小受波折，固无伤于大体，且将来大有希望也。

第二论社会亦然。中国社会制度颇有互助精神，竞争之说，素为中国人所不解，而互助则西方人不甚了解。中国礼教及祖先崇拜，皆有一部分出于克己精神与牺牲精神者。中国人之特性不能抛弃个人享乐，而欧人则反之。夫以道德上而言，决不能谓个人享乐主义为高，则中国人之所长，正在能维持社会的生存与增长。故中国数千年来经外族之蹂躏，而人数未尝减少。职此之故，因此吾以为不必学他人之竞争主义，不如就固有之特性而修正与扩充之也。

第三论经济。西方经济之发展，全由于资本主义，乃系一种不自然之状态，并非合理之组织。现在虽十分发达，然已将趋末路，且其积重难返，不能挽救，势必破裂。中国对于资本集中，最不适宜，数十年欲为之效法，而始终失败。然此失败未必为不幸。盖中国因无贵族地主，始终实行小农制度，法国自革命后始得之，俄多数派亦主张此制。而中国则固有之现代经济，皆以农业经济为基础，则中国学资本主义而未成，岂非天幸！将来大可取新近研究所得之制度而采用之。鄙人觉中国之可爱，正在此。

总之，吾人当将固有国民性发挥光大之，即以消极变为积极是也。如政治要为民本主义，惜其止在反对方面，不在组织方面；社会制度本为互助主义，亦惜止限于家庭方面，若变为积极，斯佳矣。鄙人自作此游，对于

中国甚为乐观,兴会亦浓,且觉由消极变积极之动机,现已发端。诸君当知中国前途绝对无悲观,中国固有之基础亦最合世界商标法,但求各人高尚其人格,励进前往可也。以人格论,在现代以李宁^①为最,其刻苦之精神,其忠于主义之精神,最足以感化人,完全以人格感化全俄,故其主义能见实行。惟俄国国民极端与中国人之中庸性格不同。吾以为中国人亦非设法调和不可,即于思想当为彻底解放,而行为则当踏实,必自立在稳当之地位。学生诸君当人人有自任心,极力从培植能力方面着想,总须将自己发展到圆满,方可对于中国不必悲观,对于自己则设法养成高尚人格,则前途诚未可量也。

原载《申报》一九二〇年三月十日,又见《梁任公年谱长编初稿》第九册

复 张东荪书论社会主义运动

东荪我兄 奉书及大著《现在与将来》稿本,诵悉一切 承征鄙见,仆方糜精力于他种著述,对此问题,不能有刻入详尽之解答,谨拉杂略述所怀:

我近年来,对此问题,久在彷徨闷索之中,欲求一心安理得之途径,以自从事,而苦未得。所谓闷索者,非对于主义本身之何去何从尚有所疑问也。正以确信此主义必须进行 而在进行之途中,必经过一种事实——其事实之性质,一面为本主义之敌,一面又为本主义之友。吾辈应付此种事实之态度,友视耶?敌视耶?两方面皆有极大之利害与之相缘。而权衡利害,避重就轻,则理论乃至纷纠而不易求其真是。吾每积思此事,脑为之炎,今勉强截断众流,稍定折向,然终未敢自信也,谨以质之执事。

吾以为中国今日之社会主义运动,有与欧美最不相同之一点焉。

欧美目前最迫切之问题,在如何而能使多数之劳动者地位得以改善。中国目前最迫切之问题,在如何而能使多数之人民得以变为劳动者(此劳动者指新式工业组织之劳动者而言,详下文)。

故在欧美倡此主义,其旗帜极简单明了,亦曰无产阶级与有产抗争而已。中国则有业、无业乃第一问题,而有产、无产,转成第二问题。欧美忠

① 李宁,即列宁。



实求业之人，略皆有得业之机会，但其操业所应得之利益，有一部分被人掠夺。社会主义运动，则谋所以抗正之，恢复之。其事为适合于多数人地位上之要求，故对之能亲切而有味也。我国今日之大患，乃在全国人民什中八九，欲求一职业以维持生命，且不可得。欧美有业、无产之人所处之境遇，在我国一般人视之，已若天堂。其已得有此境遇之人，方且兢兢守之，惟恐失坠。欲其冒险以从事于向上之运动，闻之将掩耳而走。抑此类人在全国中，不过占千百分之一二耳。吾辈若专为此类人谋而忘却其他，则社会所能救济者几何？是故“劳动者地位改善”之一语，在欧美言之，则一针见血也。在中国言之，则隔靴搔痒也。彼求进一工厂，每日做十二点钟不停手之工，尚且费几许情面乃能得之，今乃告之曰：“汝何不加入‘八点钟同盟’也。”彼方踟躅街市，无所栖托，今乃告之曰：“汝宜要求加工价”，此真“何不食肉糜”之类也。故今日中国之社会运动，当以使多数人取得劳动者地位为第一义。地位取得，然后改善乃有可言。

然则，中国人何故失却劳动地位耶？其原因之一部分，固由政治之混乱使然。而最主要者，乃在受外国资力之^三剥削压迫。质言之，则我国人之职业，直接为外国劳动阶级之所蚕食，而我国人衣食之资，间接为外国资产阶级之所掠夺也。以最显著之事实言之，三十年前，食于丝者几何人？食于茶者几何人？食于土布者几何人？食于土糖者几何人？乃至食于制针、制钉者几何人？而今则皆何如者？欧洲工业革命之结果，昔之恃手工业、小商业自养之人，次第失职，驱而走集于都会工厂，变成仰佣钱为活之一阶级。然彼犹有工厂可投，有佣钱可得，不过佣钱微薄而已，生活不固定而已，劳力之结果被人掠夺一部分而已。吾国国内，曾未梦见工业革命之作何状，而世界工业革命之祸殃，乃以我为最后之尾闾。畴昔食于土布者，今失业矣，能否在门治土达纺织厂佣得一辨尼？畴昔食于铁工者，今失业矣，能否在必珠卜铁厂佣得一仙？畴昔食于制糖者，今失业矣，能否在台湾糖厂佣得一钱？故外国资本家之对于其本国劳动者也，虽掠夺其劳力结果之一部分，然犹出其余沥以为河润，瘵焉而未至于死也。我国人则被其掠夺，并余沥而不可得，乃扼吾吭而绝吾粒。外国之劳动者，欲恢复其被掠夺之部分，则直接向本国资本家算账而已。其在我国，则本国人士尚不配作掠夺者，而须间接向外国资本家算账。倘终不能有向外国资本家算账之能力，则虽本国资产阶级永远不发生，而吾民之瘵而死者且日相望也。外国资本家，若悉数将其势力移植于我之通商口岸乃至内地，以从事掠夺，则我之对付彼辈，可以全仿彼国劳动阶级对付彼辈之成法，毫无问

题。今也不然，彼辈势力之移植，虽著著进行，然为势甚缓。以今日及最近之将来的情形而论，彼辈依然安坐伦敦、纽约、巴黎、大阪，以择吾肉而吸吾血。吾国之社会主义运动，无论若何猛烈，彼辈曾不感丝毫苦痛。彼辈所最愿举者，则吾国长在此种不死不活之纷扰中，生产力日益涸竭，而人生必要之消费，终不能免。我既无力自给，彼乃凭藉旧势，益恣侵略，而彼辈在本国因受劳动阶级反对所生之损失，乃于我焉取偿。信如是也，则我虽将国内资产，均之又均，若五雀六燕，铢黍罔失其平，而我社会向上之效，终茫如捕风。譬犹污池垂涸之水，大鱼跳梁，一口多吸，诚属可憎。然苟终无术以济其涸，则虽无大鱼，而群鱼之必涸死，固旦晚间事也。中国现象，若循以前之趋势而无所更张，其结果，则所谓阶级者，非自国内纵分，而自国际上横分。压制阶级掠夺阶级之大本营，在伦敦、纽约、巴黎、大阪诸地，而凡居于禹域二十一行省之人，皆被压制被掠夺之阶级也。对于外部压制掠夺者丝毫不能抵抗，而惟内部之被压制被掠夺者互争锱铢之短长，终复何益？故吾以为在今日之中国而言社会主义运动，有一公例当严守焉，曰：

在奖励生产的范围内，为分配平均之运动。若专注分配而忘却生产，则其运动可谓毫无意义。

此公例者，不必再加说明，吾信无论何人，当皆承认。既承认矣，则连属而起者有两问题。

第一，有何良法，一面能使极衰落极幼稚之生产事业可以苏生萌达，一面又防止资本阶级之发生。

试将社会主义家所提出数种主要救济方法一检校之。其第一法，则将原有生产机关，由直接在该机关内服劳役之人共同管理也。此法是否为最良之法，姑勿深论。然欲行此法，必先以国内有许多现成之生产机关为前提。若如今日之中国，生产事业，一无所有，虽欲交劳动者管理，试问将何物交去？若必勉强将国内现有区区百数十家之工业矿业所收容工人多则千数少则数十者，施行共管制度，无论各该业现役工人所得利益多少，且未敢言也。藉曰城有利矣，然食其利者最多亦不过数万人。其于全国数万万失业救济之问题，丝毫无所补益，而固有之生产力，或因此大蒙打击，决非计之得也。故此法者，在他日生产事业相当的发展之后，容或有采择之余地，今日提倡，决非其时。其第二法，则将生产事业归国家或地方经营也。此法虽原来未有之业，亦可以政治的权力创造之助长之，在产业幼稚之国，本为合宜。然欲行此法，当先以政治上有完善可信任之